

談立場

中国青年出版社

5066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匯編的四篇有關立場問題的文章，說明了：(1)為什麼要提出立場問題；(2)判別立場問題的標準；(3)立場與客觀真理、良心與正義的關係；(4)立場與人道主義、感情與政治嗅覺的關係；(5)立場與是非、利害的關係；(6)立場與動機的關係；(7)如何改變非無產階級立場、樹立無產階級立場等等。本書緊密地結合了反右派鬥爭中在立場方面暴露出來的一系列問題，並針對青年思想實際，作了精辟的論述。

本書主要文章在這次編印時，已由作者作了較多的修改。

談 立 場

本 社 編

*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 華 書 店 總 經 售

*

787×1092 1/32 1 1/2印張 30,000字

1957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1月北京第1次

印數1—50,000

統一書號：7009·100

定價(5)一角二分

223.53
5065

08504

談 立 場

本 社 編

CA7 B¹/₂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年·北京

目 次

談立場問題	楊 耳	3
树立无产階級立場	李哲人	27
談談立場	若 水	38
——某讀者和作者的談話		
立場和动机可以截然分开嗎	季 申	45

談立場問題

楊 耳

一 为什么要提出立場問題

在反对资产階級右派分子的斗争当中，为什么要提出立場問題来呢？这是因为，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既然是一场极尖锐的階級斗争，我們就必须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階級分析方法来看待斗争中的人和事，也就是說，必須在政治上分清什么是左，什么是右，什么是无产階級立場，什么是资产階級立場，才能够使人們明辨是非，划清敌我，进行正确的斗争。我們知道：在物理学实验当中，人們可以用三棱鏡把白光分为組成它的几种原色；在化学实验当中，人們可以用电解的方法，証明水是由氫和氧組成的。在政治斗争中間，我們有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階級分析方法，就可以找出极复杂的社会現象的本質，就会懂得，为什么各种社会势力对很多重大的政治問題的看法会不相同，甚至会完全相反了。我們認為，这种在政治問題上看法的分歧或对立，固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但是，最主要的，常常就是因为人們有着不同的階級立場。

右派分子最害怕人們提出立場問題来。他們說，提出立場問題就是“教条主义”，就是“用大帽子压人”。其实，如果自己的立場是正确的，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又何怕之有？右派分子所以害怕人們提立場問題，最主要的还是因为階級分析的

方法好象照妖鏡，能使他們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原形再也隱藏不住罢了。

提出立場問題来，对于加强我們自己的战斗队伍，也是完全必要的。这一場反右派分子的斗争，是一場尖銳复杂的阶级斗争。为了要贏得这一場政治上、思想上的战斗，那就必須要求每一个参加战斗的人都有明确坚定的社会主义立場。人們都懂得：敌我不分的人不能成为好战士，而动摇的軍隊是很难打胜仗的。在这次反右派分子的斗争中，有很多同志表現得很好，他們不愧为社会主义的优秀战士，可是，也有一些同志（包括少数的党员和团员），在斗争中的表現并不很好，他們当中有些人立場搖擺不定，和右派分子之間在思想上划不清界限，有些人甚至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并无义憤，听到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論也无动于衷。他們当中有些人虽然参加了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但是由于自己心中的是非还没有分辨清楚，所以在反駁右派分子謬論的时候，就不能够理直气壯。对于这些同志，只要我們向他們講清了道理，他們当中絕大部分的人，就会擦亮眼睛，分清左右，积极起来斗争的。所以，提出立場問題来，对于坚强我們的战斗队伍，动员大家起来粉碎右派的进攻，是有很大大意义的。

有人說：“談立場問題，在过去是需要的，現在已經不需要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規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經基本結束，可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剛剛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結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的阶级斗争，各派政

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用毛澤東同志這些話為指導，再來看一下右派分子的進攻，就會使許多以為今天中國已經沒有階級鬥爭的老實人大吃一驚了。這次右派分子的進攻，既然用活生生的事實，證明了階級鬥爭的存在，我們怎麼能夠不提出階級立場的問題來呢？

有人說：“成年人自然有立場問題，青年人是沒有立場問題的。”在這次右派分子的進攻中，清華大學副校長錢偉長在向學生“點火”的時候竟然說：人生三十而立，對三十歲以下的人來說，是不應該劃什麼進步、中間、落後的立場的。事實真是這樣的嗎？魯迅先生的思想發展，是最能說明這個問題的。他自己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然而後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並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作品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被轟毀，……”^①魯迅先生在這裡說的，就是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叛變了中國人民大革命之後，國民黨青年屠殺信仰共產主義的青年和其它革命青年的情況。這樣，魯迅先生就拋棄進化論的觀點，而開始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去觀察青年，觀察社會現象了。事實上，在這次右派分子所掀起的階級鬥爭當中，青年們並不是象錢偉長說的沒有進步、中間和落後之分，而是相反，他們的立場的分別是異常鮮明的。絕大多數青年對右派分子十分憤怒，

① 見“三閑集”序言。

他們堅決向右派分子作鬥爭。在另一面，也有林希翎、譚天榮這樣年輕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這些青年右派分子，公開散布仇視共產黨和仇視社會主義的荒謬言論。這樣，難道還可以說青年沒有立場問題嗎？

右派分子挑撥說，“提出立場問題，就是不相信群眾的覺悟程度。”其實，我們向群眾提出立場問題來，正是表明我們對群眾的覺悟，具有充分的信心。我們深信廣大群眾是分得清大是大非的，他們當中有許多人雖然被右派分子蒙蔽于一時，可是，在我們提出立場問題之後，就迅速地和右派分子划清了界限。這不正是可以證明，我們對廣大群眾覺悟程度的信任，是完全正確的嗎？

二 人們的立場是否可以客觀地判斷呢？

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會違背“真理”、
“良心”、“公理”和“正義”嗎？

這次右派分子向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事業進攻，是在高舉着“幫助黨整風”的幌子下面進行的。他們一面做着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勾當，另一面却在口頭上宣布自己是站在社會主義立場上的。章乃器說：“我愛護黨就象愛護自己的眼珠一樣。”羅隆基說：“就是把我的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出反對社會主義的企圖來。”右派分子顧執中在被揭發的時候，說人們講話有四類情況：好心說好話，好心說壞話，壞心說好話，壞心說壞話。他說他自己就是屬於“好心說壞話”那一類的。以上這幾個右派分子的無恥狡辯，本來是毋須再費力去駁斥了，可是，這裡也有一種比較容易迷惑人的謬論，值得進一步加以揭露，這就是按他們那樣講法，似乎人們的立場，除了自己以外，別

人都是无法了解的。这也就是说，人們的立場，对于別人都是“不可知”的。人們的立場是不能够客觀地判別的。

我們認為，人們的立場是可以客觀地判別的，人們的政治立場不是不可知的，因为它并不是什么抽象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如果說，一般的東西总是存在于个别的或特殊的東西里面，本質总是存在于現象里面，那么，人們的基本政治立場，总要表現在他們对待許多政治問題的态度上面，也就是表現在他們对待这些政治問題的言論和行动中間的。人們是否站在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場上，不能光听他們自己說的什么“把骨头燒成灰也找不出反社会主义的企图来”之类的鬼話，而是要看他們的言行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事业。毛泽东同志已經向我們指出了判別香花和毒草的六項政治标准，用这六項标准来具体檢查人們的言行，那么，是否站在社会主义立場上，是可以分辨清楚的。这就是說，要判断一个人是否真的站在社会主义立場上，就要看他是否拥护共产党的領導，是否贊成社会主义改造，是否贊成人民民主專政，是否贊成民主集中制……。另外，要判断一个人是否真的拥护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就要看他是否拥护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策，是否拥护对重要农产品和其他重要商品的統購統銷政策，是否拥护肃反运动，是否拥护对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所以，在当前反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区別人們究竟是左派还是右派，也是完全可以根据他們平日的言行以及大放大鳴当中的言行而客觀地判別的。客觀的事实既然推不掉，那么，他們的右派立場是无法推掉或賴掉的。

有的人进一步問：判別人們行为的正确和錯誤，是否有客觀真理性的标准呢？站在无产階級立場上，不过是用“无产阶

級的私利”作为判別是非的标准罢了，这是否会和“真理”、“良心”、“公理”和“正义”相違背呢？我們为什么不可以不談什么无产階級立場，而凭“良心”和“公理”、“正义”等等作为判別是非的标准呢？

站在无产階級立場上，是否就是以这一个階級的“私利”或“偏見”，作为真理的标准呢？这确实是一个應該首先弄清楚的問題。在階級社会中，敌对階級的利益是互相冲突的。如果人們都以自己階級的利益作为真理的标准，那么，在階級社会里，怎么会有客观真理可言呢？不，事情并不是这样的。我們認為，在人类社会現象、包括有階級的社会現象中，是存在着客观真理的。什么是人类社会現象当中的客观真理呢？这就是社会要不断地前进，生产力要不断地发展。这种进步和发展是对于人民有利的。因此，人們的行动，凡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能够推动历史前进的，就是合乎客观真理的，是終归可以實現的。相反，人們的行动，凡是不利于社会进步的，甚至还是阻止社会进步的，就是違背客观真理的，是終归要失敗的。在人类历史的現阶段，資本主义正在走向沒落和灭亡，社会主义却象初升的太阳一样，光芒万丈，正在取得日益巨大的胜利。当前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无产階級是能够推动历史进步的最先进的階級，而資产階級已經成为力图阻止社会前进的衰朽力量了。資产階級对于自己必將灭亡的命运，是十分害怕的，是絕不肯承認的，所以，他們就坚决否認社会主义必將胜利的客观真理，咒罵揭露了这种社会发展規律的馬列主义是异端邪說。因此，他們的立場，就是完全違背客观真理的。相反，无产階級絲毫用不着害怕客观真理，它既和任何私有制不发生联系，它負有消灭一切剝削制度和解

放全人类的崇高使命，所以，它是大公无私和最有远見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历史发展利益，既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一方面，必须坚持客观真理，才有利于无产阶级的解放；另一方面，也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才能够認識真理、坚持真理。那种以为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就是维护无产阶级的“私利”，就会違背真理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

“不要无产阶级立场，凭良心（或‘公理’、‘正义’）办事”，說来很好听，其实是一句空話。因为，在阶级社会里，抽象的、超阶级的抽象的“良心”、“公理”和“正义”等等，是不存在的。在阶级社会里，“良心”、“公理”、“正义”都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例如，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看来，剝削旁人的劳动，是十分不合乎“良心”、“公理”和“正义”的，可是，从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看来，剝削行为是完全合理的，在“良心”、“公理”、“正义”面前是絲毫无可非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如果要保持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良心”，维护他們所理解的“公理”“正义”，就必然違背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良心”、“公理”和“正义”，并且会使社会的进步受到阻滯。相反，我們如果要保持工农群众的“良心”、“公理”和“正义”，如果要为推动历史前进而努力，我們就不得不把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良心”“公理”和“正义”的虛伪面貌加以揭穿，指出他們利用这些好听的名辭来掩护他們剝削行为的实質，并且站到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方面来。

認為世界上确实存在着所謂一般的“公理”“正义”的人，他們是不心服的。他們說，难道反对压迫、反对以大压小，反对以强凌弱，不是普遍适用的“公理”嗎？我們来仔細看一下吧，反对压迫，反对以强凌弱、以大压小，这确实該算作坚持

“公理”和“正义”了，但是，离开阶级立场而谈反对“以强凌弱”就会做出最坏的蠢事来。这种不分敌我而喜欢“打抱不平”的“好心”人，他们会在过去反动派压迫人民的时候，坚持“公理”“正义”的精神而反对反动派，可是，在革命胜利之后，人民的政权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时候，他们又会抱着同样的“公理”“正义”精神来反对人民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压迫”了。他们认为任何压迫和强制都是坏事情。他们说，“应该给一切人以自由”。他们认为应该对反革命分子一律实行无原则的“宽大”，事实上，也就是主张放虎归山和纵蛇归壑。这难道不是一件极端荒唐危险的事情吗？瞿秋白同志翻译的俄国作家卢那察尔斯基写的一个剧本——“被解放了的董·吉诃德”，就叙述了这位具有超阶级的“良心”、“公理”、“正义”的保卫者，如何被剥削者利用的故事。这种超阶级的“良心”、“公理”、“正义”的保卫者，由于不懂得社会斗争的客观规律，结果就弄得自己到处碰壁。这种老实到滑稽可笑的“董·吉诃德”，尽管善良而勇敢，但是，他们的努力，不仅不能够给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真正有益的帮助，而且还要常常被野心家所利用，作出许多违反本意的、不利于人民的坏事来。

如果有人以为我们反对抽象的、超阶级的“良心”，就是一般地反对人们有为人民服务的善良愿望（或良心），那就是大错特错了。我们是欢迎这种善良的愿望（或良心）的。但是，我们认为，在现阶段的人类社会中，要真正实现这种善良的愿望，就必须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很显然，如果人们虽然有着为最大多数人服务的良心（善良愿望），但是不把这种善良的愿望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也即不能把这个良心和对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研究结合起来，又怎么能够保证这种

善良的主觀願望不是不能實現的空想呢？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所說的無產階級立場，並不是別的，也就是這種解放最大多數人（無產階級和其它勞動人民）的良心，和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發展的科學研究的結合罷了。十八世紀後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聖西門和傅立葉），可算是有為了大多數人的解放而奮鬥的善良願望了，可是，由於不懂得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他們的良好願望都不能實現。只有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把解放最大多數群眾的願望，建立在對歷史發展規律的科學研究的基礎上，這樣，人類對社會主義的美妙理想，才由空想變成了科學。

不去科學地研究社會發展的規律，只是片面地、自以為是地憑着主觀願望辦事，不僅常常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甚至還會犯很大的錯誤。例如，中國曾是一個小農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家，如果我們不懂得只有實行工業化和合作化，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才能徹底解放農民，而是錯誤地站在個別農民的立場上，認為農民生活既然還不算太好，就不應該積累資金去搞社會主義工業化，而應該把這些資金分散，用來改善農民的生活，這樣做的“動機”，大概也是“善良”的吧，但它的實際結果，卻會使中國永遠停滯在一個農業國的水平上，不能變成工業國。這樣，生產力既不能很快發展，農民生活也不能有真正的提高。由此可見，為大多數人利益服務的良心，必須建立在研究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基礎上。只有站在能夠推動社會生產力向前發展的階級這一面，才能够真正推動歷史前進，並且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解放。在現階段，這個能夠推動歷史前進的最先進的階級，就是無產階級。

有人說：“不要光講無產階級立場吧，講全民立場難道不

更好些么？”全民立場，說起来很漂亮，可是，当“全民”还分裂为階級的时候，硬要否認这种对立，又如何办得到呢？这不过是老实人的幻想罢了。而且，剝削階級总是用所謂“全民”的口号来欺騙被剝削者的，所以，贊成“全民立場”的人，客觀上就会給剝削者帮忙。

有人說：“为什么不提倡人道主义的立場呢？”人道主义是好东西，可是，如果离开了階級立場空談什么人道主义，同样也会有利于敌人。請問：世界上还有比消灭剝削制度的革命事业还更“人道主义”的事业嗎？工人階級是十分贊成人道主义的，但是，“人道主义”只能实行于敌人真正放下武器和真正表現决心悔改之后。对于死不悔改和仍然手执武器的敌人，是决不能空談什么“人道主义”的。“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同志的殘忍”，这句名言，值得一切提倡抽象的“人道主义”的人深思的。中国的古代寓言“中山狼”的故事，也值得这些提倡抽象的“人道主义”的好心人仔細一讀。

有人說：“凭‘真实’办事就行了，用不着什么工人階級立場！”这个“真实”（或“真誠”）也是一个动听的名詞。可是，請問，一面有工人、农民階級遭受資本家和地主階級殘酷剝削的“真实”，另一面也有資本家和地主階級因为不甘心被工人农民階級所推翻而十分“痛苦”的“真实”，你究竟支持哪一方面呢？如果你是一个新聞記者，或者是一个文艺家，你是否对双方都同样地支持，或用同样的同情眼光来报道或描写呢？如果你那样作了，那么，你的“真誠”尽管在表面上很客觀，但是，在实际上，不就是支持了資本家和地主統治制度使其免于灭亡么？而且，离开了无产階級立場，就会看不見历史正向何处发展的这一項最重大的“真实”，就会歪曲对事情的正确看法。

例如，肃反工作的成績本来是十分巨大的，缺点本来只是个别的，次要的。可是，从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場看来，就会把肃反工作的个别缺点，大大地加以夸张，把肃反工作說成“糟透了”。所以，帶上剝削階級的眼鏡而大談“眞实”，只不过是“眞实”这个好听的詞句騙人而已。

三 談談人們的立場和感情、政治嗅覺的关系

人們的階級立場，决定着人們的政治观点。人們站在敌对的階級立場上，就会对各种政治問題，有完全相反的看法。这一点，我們不再去詳細研究了。我們这里專門談談这种現象：有很多的人，他們是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領導的，可是他們在許多問題上又常常容易接受右派分子的影响；他們在右派分子被揭发之后，对右派分子是反对的，可是他們又对右派分子抱有很多的“溫情”，不贊成對他們进行严肃的斗争。另外，他們的政治嗅覺常常很不灵敏，很容易把右派分子当作好人，把右派向党进攻当作真正“帮助党整风”。只有在右派被彻底揭穿之后，他們才大吃一惊。

对于以上这种情况，有人說，“这只是感情問題，是政治嗅覺不高，并不是立場問題。”事情是否就是这样簡單呢？立場和感情、政治嗅覺之間的关系究竟怎样呢？

对于立場和感情的关系，人們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論調：“我的立場問題是解决了的，只是感情还没有轉过来。”“理智上是接受了，可是感情上还不能接受。”当然，这种所謂“思想和感情的矛盾”、“理智和感情矛盾”的心理状态，大概是有的。可是就其实質而言，这种矛盾，是否能和思想立場上的矛盾截然分开呢？恐怕我們很难否認，感情上的动摇，正是反映

了立場的動搖，而感情上的敵對，實際上也就是立場敵對的一種表現吧。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在講到他對知識分子和工人的感情變化的經過之後說道：“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毛澤東同志的這篇文章，很值得許多在感情上還沒有起變化的同志們再仔細地、認真地讀一讀。

談到感情的起變化，我們只要留心地想一想，就會發現不少知識分子，在許多具體問題上，是和无產階級在感情上有距離的。首先，就說對黨的看法吧。在這次右派分子的進攻中，右派分子用了各種最惡毒的話來咒罵共產黨，說黨是一個自私自利的、以“黨天下”為目的的小宗派，說黨員是“惡霸”、“土官僚”、“小和尚、小尼姑”、“沒有人性”、“無惡不作”……許多工人農民听了之後感到非常憤怒，許多知識分子也非常憤怒，可是，也有少數的知識分子听了之後却泰然處之。而在工人農民向右派分子反擊之後，他們卻認為工人的態度“缺少雅量”，“太過火”了。前後兩種感情如此地不同，這難道是偶然的么？

我們再來談談集中與民主、紀律與自由的問題吧。許多知識分子對於解決這兩個問題的基本原則，一般都是了解的，但是，他們在“感情”上常常是有所偏向的。例如，他們雖然在口頭上承認應該實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心裡卻喜歡極端的民主；口頭上贊成有領導的自由，心裡卻喜歡無限制的自由；口頭上承認必須有嚴格的紀律，感情上卻傾向於最好對自己不要加上“過多的”紀律。在這些問題上，有覺悟的工人、農民或其他勞動人民的心理狀態是和知識分子有很大的不同的，甚至還是互相對立的。工人農民在組織性和紀律性方面，一

般說來，要比知識分子表現得良好。這難道只是由於“感情”所致嗎？

再拿“才”與“德”的問題來說，這兩者本來是不能偏廢的。這裡所說的“德”，在階級鬥爭的環境中，首先就是指能夠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政治品質。我們認為，不分敵我，沒有正確政治觀點的人，即使“才”高，實際上也還是沒有靈魂。可是，有些知識分子和立場不穩的人，口頭上雖也承認“德”是根本的東西，心裏面却是只重“才”不重“德”。他們認為，無產階級的立場是在一個早上就可以鞏固地建立起來的，因此，他們就提出了所謂“先專後紅”這個在實際上是只要業務不要政治的錯誤口號。他們認為，在現在建設時期，政治家是不重要的，即使是經過長期政治鍛煉的老幹部也沒有什麼重要的作用，而有“才能”的科學家或其它高級知識分子，那怕他們是反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也是十分“寶貴”的。他們反對在培養幹部的時候進行政治審查和政治教育。試問，這些觀點不都是資產階級的觀點嗎？如果我們選擇和任用幹部的時候，不問他們的政治面貌，以致我們培養出來的幹部，有很多是敵我不分的人，甚至還是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我們又怎麼能夠期望他們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呢？又怎麼能夠保證社會主義事業不會被他們損害和傾覆呢？

又如，每逢發生象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或鎮反肅反運動等等尖銳的階級鬥爭的時候，許多思想胡塗的知識分子和立場有疑問的人，首先不是支持工人的正義行動，而是首先懷疑群眾的行動是否“過火”了，是否有“偏差”。他們的同情，常常是向着被鬥爭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違法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方面。他們在口頭上對這些大運動的成績也勉強承認，而